

## 編序

---

從 2002 年開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同並輪流主辦「台灣-香港社會意向研討會」。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了七本論文選集，包括：《香港社會政治的延續與變遷》（2004）、《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台灣的經驗》（2006）、《新世紀臺港社會風貌》（2008）、《解讀臺港社會意向》（2011）、《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2013）、《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2014），和《台灣與香港的青年與社會變貌》（2016）。

第八屆研討會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順利舉行。本書《香港與台灣的社會政治新動向》是該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經修改並審查後的選集，也是此一系列的第八本書。

顧名思義，社會意向就是民眾對時下社會政治現象和議題的判斷與傾向；本質上這些判斷與傾向必須透過經驗資料來鋪陳和解讀。既然是在台灣和香港同步進行的社會議題調查，除了對台港兩地社會的民眾意索（ethos）分別剖析之外，也應將台港的焦點議題進行比較，這樣做符合調查計劃的初衷和企圖。之前的七本選集專書，其論文多數是對台港社會意索分別探討，就一特定議題將台港兩地一併比較分析只是少數。因此，將兩地作比較的工夫往往由讀者承擔，但這樣做的話也只能作大體上的參照，而不易對特定議題或現象進行深入比較，要做稱職的比較研究畢竟是比較費心思的，尤其是要在對照的統計數據之後找合宜、妥當的脈絡因素，以取得解讀的思路和靈感，就

更是不易，這需要分析者對台港社會政治變遷的長期趨勢和短期動態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唯有如此，才能在對照數據之餘，找到數據異同背後的社會學意涵。

基於此，本書將收錄的八篇論文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香港篇和第二部分的台灣篇之後，特意開闢了第三部分的比較篇。雖然比較篇只有三篇文章，但數量上比早期專書所分別收錄的比較分析文章要多些了。

香港篇的三章，分別探討三個新的社會政治動向，即本土意識（主義）的新集體歸屬感、社會撕裂和矛盾的惡化，和自中國內地移入香港的移民在過去 30 多年來所呈現的某種特殊社會流動問題。台灣篇的兩章，則分別剖析兩個日漸冒起的新政治和社會趨勢，一是民粹政治的竄起，二是對核能發電何去何從的社會民意爭議。至於比較篇的三章，是在台港社會的長期趨勢中，企圖掌握兩地近年出現的新傾向，一是婚姻的去制度化，二是社會信任基礎的鬆動，三是青年社會流動的不同遭遇和感受。我們希望這三章和前七本書所收錄的台港比較論文，能構成台港比較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以下分別對三部分各章的重要論述作簡述，以饗讀者。

第一部分香港篇收錄三篇論文。第 1 章為〈何謂香港本土主義？歸屬感的分析視角〉，作者黃子為、鄭宏泰和尹寶珊界定本土主義為對地方的情感依附，基本推論是假若年輕人較重視本土文化和利益，他們理應對香港有較強的歸屬感，因而有較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較不支持兩地融合和建制派政團，以及較積極支持民間社會運動。根據作者的分析，在短短十年間，香港已出現了兩代的本土主義：第一代反對偏重發展，提出地方居民和政府共同建設地方社區、保護本地文化；第二代的基調是「反中國」，並成為近年青年社會運動的主流思想。作者運用 2016 年的民調數據，發現香港人的本土歸屬感不低，不過，年輕人的本土歸屬感不比中年人和年長者強烈，本土歸屬感和對社會運動的支持度也沒有顯著關聯，而且歸屬感較強者不一

定較反對香港與內地融合，和不一定不支持建制派政團，這些人反而傾向抱持較弱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和較高的政治滿意度。這些研究結果比較貼近第一代本土派的看法，與第二代本土派的觀點相距甚遠。質言之，作者的研究結果不支持「年輕世代多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對香港擁有強烈的歸屬感，因而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認同『反共抗中』的論述」。

第 2 章為〈香港社會撕裂：民意數據描繪的圖像〉，作者鄭宏泰、尹寶珊和黃子為認為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看法的差異較能反映社會撕裂的狀況，所以運用 2016 年的民調數據，將香港人分為支持與不支持者兩大類，比較他們對個人與家庭狀況、社會與政治信任、歸屬感、認同感、社會問題感、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觀感。分析結果顯示，支持和不支持民主運動者的對立，聚焦於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取態，例如，他們的社會信任度基本相若，但對向中央政府負責的行政長官的信任度，則有高低之別；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並無二致，但對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有明顯的差異；他們對香港經濟、社會及政治前景的信心相近，但對民主制度的支持度則強弱互見。更涇渭分明的，是他們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效應評估和政策取向：支持民主運動者對兩地關係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效應評估，不但較不支持者負面，對於兩地關係何去何從，亦較不支持者抗拒加強融合。因此，作者認為當前香港社會的撕裂，既有衝着中國或中央政府而來的勢頭，又有拒絕求同存異的跡象，彼此的衝突難免愈趨激烈。

在第 3 章〈內地移民在香港：二十年來的社會流動〉中，作者方偉晶和郭樺利用 1981 至 2016 年的香港人口普查數據，對比本地出生人士與內地來港移民的收入差別，發現在 1997 年以後，近期移民（即居港少於七年者）、較早移民（即居港滿七年者）與本地人的收入差距，均有所減少。作者使用 Blinder-Oaxaca 分解分析法，發現個人稟賦（包括學歷、年齡和性別）在解釋內地移民與本地人的收入差距時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

而在 1997 年之後，個人稟賦回報所起的作用則在減少。作者認為，這現象表明內地移民受惠於 1997 年之後的社會環境變遷，尤其是去殖民化過程，以及香港與內地加強社經聯繫，令內地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較少的懲罰，學歷此項個人稟賦在收入中的重要性得以增加。換言之，後殖民地身分認同或身分政治，是適用於理解內地移民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的經濟融入動態。

第二部分台灣篇收錄兩篇論文。在第 4 章〈韓流與柯粉：台灣民粹政治的社會起源〉中，作者林文正和林宗弘指出，全球經濟環境快速變化，世界各地出現相似的民粹政治風潮，台灣也不例外，韓國瑜和柯文哲兩位民粹政治人物於 2018 年選舉中崛起，便是一例。民粹領袖帶動的政治競爭，能凸顯社會階級間的新競合關係；而民粹領袖與階級結盟的形態，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民粹類型。作者運用 2018 年 6 月和 12 月的民調數據，分析韓國瑜和柯文哲的選民組成與變化，發現族群和身分認同仍是穩定的社會心理因素，足以構成解釋民眾支持特定對象的基礎。作者亦估計了階級對「政黨傾向」（泛綠與泛藍），以及「是否支持柯文哲 2020 年參選總統」的邊際效果，結果顯示，相對而言，這半年間激增的泛藍支持者，主要是失業者、非技術工人和自營作業者，這與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相若；而柯文哲支持者的社經特徵，則較類似泛綠民眾，很可能是泛綠陣營中對世代正義或勞動權益政策不滿的人士。由此可見，台灣目前的階級貧富分化和產業轉型困境，相當程度來自全球化和依賴中國等結構性因素，危及中小企業、農民、自營作業者與失業者的生活處境，國民黨透過「兩岸開放發大財」的論述來引爆政治「韓流」；「柯粉」的社經特徵則不太符合民粹主義，反而展露了泛綠陣營的內部社會分歧。

第 5 章題為〈永續發展與核能政治：台灣核四發電廠封存爭議的社會意向〉，作者楊文山和施奕任立基於環境社會學與永續發展理論，利用 2013 年的民調數據，檢視台灣民眾對於第四核電廠（簡稱核四）興建及運轉與否的意向。作者指出，超

過六成受訪者同意核四應該停建且不要運轉，顯示隨着環境意識的興起，反核倡議影響了多數民眾的想法。從社會面看，過往的核能決策缺乏社會對話，致使民眾不信任政府的核能政策。從經濟面看，民眾多不願意為了廢核而承擔更高的經濟代價，顯示社會對於積極推動再生能源，還未達成共識。從生態面看，民眾在核能議題存在高度的風險感受。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經濟面會影響民眾對核能政策的態度，政府需規劃更穩健的能源結構，以應對核能比重降低的潛在衝擊。此外，不同性別、學歷、婚姻狀況、收入、階級、政黨認同人士對核能政策的態度不盡相同，政府應更積極披露資訊和推動溝通，為核能議題及能源政策凝聚社會共識。

第三部分比較篇收錄三篇論文。在西方社會，去制度化對婚姻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鑒於經濟發展和個人主義膨脹被視為去制度化的主因，華人社會的婚姻形態亦隨着經濟快速增長而趨近西方社會，丁國輝在第 6 章〈婚姻去制度化：華人社會的取向〉，運用 2012 至 2013 年間進行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數據，以對離婚、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的態度為指標，探討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華人對婚姻制度的取向，以及四類價值取向對婚姻去制度化態度的影響。作者首先發現，華人社會普遍不認同婚姻去制度化，其中以中國內地與新加坡尤甚；華人對婚姻制度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美國人。其次，價值取向的影響大致與作者的預期相若，即傳統取向和家本取向會減低認同，公民取向和個人主義取向則會增加支持；主導華人社會婚姻去制度化的動力，與美國亦不盡相同。作者認為，新加坡的情況，以及華人社會與美國社會的顯著差異，說明經濟發展和個人主義不足以解釋對婚姻去制度化的取向，必須兼顧政治體制和文化因素的影響。

在第 7 章〈社會信任的基礎：台灣與香港的比較〉中，作者吳齊殷和張允誠指出，個人觀點和社會結構雖被視為影響社會信任的關鍵因素，但鮮有研究同時探討不同面向的個人和社

會因素與社會信任的關係，因此，他們將個人層次區分為「主觀」及「客觀」面向；社會層次則分為「台灣/香港未來發展」及「政府機構信任」面向，並使用 2016 年的民調數據，探討此等個人及社會因素，如何對台港民眾的一般信任產生影響。結果顯示，在台灣，個人層次的主觀因素與社會信任的相關性，顯著高於其他因素；在香港，個人和社會層面的因素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然而，綜合兩種層次不同面向的模型比較，若遵從精簡且配適的原則，無論是台灣或香港，個人層次的主觀評估與社會信任的關係最為密切，這與過去文獻的結論基本一致。

2014 年，台灣和香港先後爆發由青年主導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坊間對此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分析，在第 8 章〈台港青年的社會流動：客觀狀況與主觀認知〉中，作者蕭新煌、鄭宏泰、尹寶珊和黃子為挑選了「上位論」，兼用客觀和主觀指標，從學業、就業和自置居所三個領域，勾勒台港青年的社會流動現況，及其在過去 20 多年間的變化。就客觀狀況而言，九項官方統計顯示，由 1990 年代後期至 2017 年間，兩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大幅提升，職業晉升和回報雖明顯落後，但也沒有呈現惡化之勢，最大問題在於青年自置居所的負擔愈益沉重，這造成他們維持以至提升生活質素和階級地位的一大障礙。在主觀認知方面，根據 2016 年的民調數據，自覺過去五年經歷向下流動，或對向上流動前景缺乏自信的台港青年，均屬少數，這顯示兩地青年對個人流動的主觀感受，與社會流動客觀指標的結果基本一致——並非傾向負面。然而，台港青年對當地青年於過去、目前與未來的向上流動機會，則有迥異的觀感——大都傾向負面。由此可見，台港青年雖未必視社會流動為個人面對的困難，但卻傾向將之界定為整體社會的問題，覺得其他青年多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

總括而言，本書各篇論文都運用隨機抽樣民意調查資料，就台灣和香港當前的社會政治動向，提供敏銳的觀察和深入的

分析。由進行民意調查、籌辦研討會，到本書得以問世，我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行政支持和經費資助。對參與歷次社會意向調查和 2017 年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我們深表感謝。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鍾雪怡、梁月蓮和陳韻晴協助資料分析和文稿校對等工作，也在此對他們謹表謝意。

蕭新煌、楊文山、尹寶珊、鄭宏泰

2020 年 9 月